3版 高郵日報
副刊
2026年7月17日 星期五
丙午年六月初四
责任编辑:居永贵
版　　式:纪　蕾
在线投稿:https://tg.gytoday.cn　新闻热线:84683100
刊头题字:周同

孟城驿
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http://www.gytoday.cn

高邮湖西有个汉高帝庙

□ 许伟忠

高邮人常常津津乐道于临泽的子婴庙，而对位于湖西的汉高帝庙则很少提及，似乎有点厚此薄彼。明嘉靖《扬州府志·礼乐志》载：“历代帝王遗庙……汉高帝庙，庙在高邮州沛城村；汉更始皇帝庙（同上）。”雍正《高邮州志·祠祀志》载：“汉高帝庙，在沛城村。汉更始皇帝庙，在沛城村。”明、清其他版本《扬州府志》以及清代各版本《高邮州志》皆有大致相同的记载。这清楚表明：高邮沛城村汉高帝庙，包括汉更始皇帝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。本文尝试对汉高帝庙初立与演变、沛城村地理位置、沛城村汉高帝庙的属性和地位等作一些初步的解读。

一、汉高帝庙初立与演变

汉高帝即汉高祖刘邦，汉高帝庙则是按朝廷统一谕令建立的官方寺庙。经历了京师首立高庙→各郡国立高庙→扩大立太宗庙、世宗庙→巡幸立庙→罢郡国高庙的演变过程。汉高祖十二年（前195），刘邦驾崩，太子刘盈即位为汉惠帝。即位之初，于长安首立汉高祖庙，定庙号太祖，谥号高皇帝。并谕令各郡国皆立高庙，与京师高庙形成呼应。《汉书·惠帝纪》载：“（高祖十二年）四月，高祖崩；五月丙寅，太子即皇帝位，……令郡诸侯王立高庙。”郡国高庙选址一般在郡治、诸侯国都的核心礼制区，以彰显其官祀属性。仿长安高庙“前殿后寝”形制，前殿祭祀，后寝藏神主与衣冠，规模按郡国等级适配。正名“汉高帝庙”，神主书“太祖高皇帝”，与京师一致，以强化正统认同。刘邦故里沛县作为特例另立“原庙”（前190年）。四时祭祀与京师同步，分别于四季首月举行；遇有重大事件，如平乱、灾异等另举行“告庙”仪式。祭品用太牢及四季应时祭品。

延至汉武帝、宣帝年间，相继立太宗、世宗庙，并形成“行幸立庙”的补充网络。郡国庙体系不断扩大，祭祀频次与耗费持续攀升，以致朝廷和地方皆不堪重负。“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，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，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、太宗庙。至宣帝本始二年（前72），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，行所巡狩亦立焉。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，合百六十七所。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，与太上皇、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，并为百七十六。”（《汉书·韦玄成传》）至元帝永光四年（前40），元帝与韦玄成等大臣廷议，以不合古礼、耗费过巨、强化中央集权等为由，下诏罢郡国高庙。《汉书·元帝纪》载：“冬十月乙丑，罢祖宗庙在郡国者。”叫停郡国四时官祀高庙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郡国高庙建筑逐渐废弃。唯一特例是沛县原庙未被撤销，但祭祀降级，仅作为陵庙类纪念场所，非法定郡国庙。至东汉时期，洛阳立高庙为京师宗庙，地方无官立高庙。偶有皇帝，如汉光武帝刘秀曾亲往沛县原庙祭祀，但仅属特例，非地方官祀制度的恢复。魏晋隋唐以至清末，直到近现代，均未恢复官方“郡国高庙”制度。地方虽零星出现汉高帝庙，多为民间或地方官出于纪念、教化所建，不再属于“郡国官庙”体系，与汉代官庙制度无传承关系。

二、全国唯一以“沛城”命名的村

扬州、高邮地方志均载，汉高帝庙在沛城村。那沛城村位于何处？查隆庆《高邮州志·疆域·厢里》载，其时高邮境域划分为“丰谷、武宁、武安、昌平、德胜”5个乡，其中昌平乡“在州治西北，辖三村七里：曰黄林村，三里；曰沛城村，二里；曰平阿村，二里。”隆庆《高邮州志》成书于隆庆六年（1572），是现存最早的《高邮州志》，距今近500年。在此之前，高邮关于乡、村、里的划分已经形成，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，少有变化。需要注意的是：清代以前，高邮全境仅划分为5乡23村，西北仅有一个昌平乡辖三个村，故沛城村比之今天的行政村面积肯定要大得多。沛城村分为沛城西村与沛城东村，乾隆《高邮州志》载：“沛城西村三总七里；沛城东村三总八里。”查阅乾隆志《州境图》，运河以西偏南方位，有“三总七里沛城西村”，下方有“三总八里沛城东村”；西村、东村南端汇合处有一“沛城尖”；紧挨沛城尖西部的是毛塘港；沛城东村东部是新开湖，往北略东是甓社湖。如果以毛塘港、新开湖、甓社湖等几个今天人们较为熟知的地名，特别是毛塘港为坐标，那么古代沛城村的具体方位还是比较清楚的。毛塘港又叫茅塘港，隆庆《高邮州志》载：“茅塘在州西南二十里。”雍正《高邮州志》载：“相公坟：不详其名、代。或曰：丞相汪广洋坟也。其坟方三十余亩，在城西十五里茅塘港口。”由此基本可以确定，沛城村位置约在今运河以西，距离高邮城区约15华里，与人们常说的“相公坟”位置相邻。

“沛城村”地名在州志中屡有出现。如雍正《高邮州志·山川·形胜》载：“马家冲，在沛城西村，去城五十里。”“聂里荡，在州西三十里沛城村，南通七里湖，东至新开湖，北绕沛城村，阔二里，长三里。”“自来墩，在湖西沛城村，三十里。”沛城村历史上曾是高邮望族孙氏居住地。史载，南宋以后，孙觉（字莘老）后裔为避战乱，流寓他乡。明洪武六年（1373），孙觉十五世孙孙惟善、孙惟纶一支由苏州回迁高邮，世居沛城村，称“沛城孙氏”。清代孙仝辙辑录孙氏先辈德行义举的《沛城孙氏遗事》一卷；至道光年间，其侄孙孙应科扩充成《孙氏遗事》四卷，收入《犹存集》。孙惟善九世孙、进士孙宗彝咏《耿庙神灯》诗云：“停云丛树影孤清，尚有灵光接沛城。横出沧波三岛上，倒悬天汉七星明。……”由诗句“尚有灵光接沛城”可推知，沛城村位置与耿庙相邻，距离不远。

历史上沛城是一个专有地名，通常指今徐州市的沛县，简称“沛”，有沛泽、古沛、小沛、沛邑等别称。又特指沛县治所所在地，2014年10月，撤沛县沛城镇设沛城街道。沛县是汉高祖刘邦故里，而沛城作为村名，全国仅此一例。如同高邮是全国两千多个县市中唯一以“邮”命名的城市一样，“沛城村”也是唯一以“沛城”命名的村。那么，古代高邮湖西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以“沛城”命名的村，并建汉高帝庙祭祀呢？唯一合理的解释是：这必然与汉高祖刘邦或高庙祭祀活动相关。

三、沛城村汉高帝庙的属性和地位

明嘉靖《扬州府志》卷之十一《礼乐志》载：“历代帝王遗庙：……汉高帝庙，庙在高邮州沛城村。”将沛城村汉高帝庙归类于“历代帝王遗庙”，给予其皇家寺庙的身份。雍正《扬州府志》卷之十四《祠祀·高邮州》载：“汉高帝庙，在沛城村。汉诏天下诸侯王，各立高帝庙。”雍正《高邮州志》卷之六《祠祀志》载：“汉高帝庙，在沛城村。按：汉时诏诸侯王各立其庙。”乾隆《高邮州志》卷之四《古迹》给出了大致相同的理由：“汉高帝庙，在沛城村。汉诏天下诸侯王各立高帝庙。”三志说法与《汉书》记述的汉惠帝“令郡诸侯王立高庙”一致，表明沛城村汉高帝庙是遵朝廷诏令所立，其地位属于郡国官庙。始建时间应在汉高祖十二年（前195）五月后不久的某一时期，距今约2200余年，与高邮建县时间大致相同。史载，前195年，刘濞受封吴王，定都于广陵，高邮是他的封县之一，沛城村汉高帝庙应属吴国所立的高帝庙。那么，刘濞为什么没有按照规制，将高帝庙建在都城广陵，而选址在高邮湖西呢？这并不难作出回答。稍后于此，西汉元狩六年（前117），汉武帝改江都国为广陵国，刘胥为第一代广陵王，他生前就将自己与王后的陵寝选定在神居山，与沛城村位置邻近；再有前文提及的“相公坟”，可证曾有宰相级别的高官将墓址选在茅塘港口；更有孙氏后裔明初回迁高邮，世居沛城村。凡此种种，一个世俗的、合理的解释是：这是一块得到世人青睐的风水宝地，吴王选择在此建汉高帝庙顺理成章。

沛城村高帝庙亦有可能是为纪念沛公曾经此地建立的纪念场所。雍正《高邮州志·祠祀志》分析沛城村建汉高帝庙的另一个缘由：“又，高帝沛人，或王曾至此地云。”这个分析的合理性在于：刘邦是沛县人，沛县与高邮同在今江苏省内，距离并不算远。刘邦在建立大汉王朝之前，南征北战、东征西讨，不排除途经此地的可能性。为纪念刘邦曾经此地，当地人便以沛城为其地命名，并建庙祭祀。但汉高帝庙不是谁想建就能建的，必是得到了沛公本人首肯或上级官府的批准，再由地方官府和当地士绅实施。进一步分析，州志云“或王曾至此地”，可见彼时经过此地的刘邦是“王”还不是“帝”。早年刘邦起兵沛县，百姓拥立他做县令，故世称沛公；项羽分封之后，楚汉相争之时称“汉王”。如果这个分析成立，则沛城村建汉高帝庙的时间，应在朝廷谕令立郡国高庙之前。

沛城村汉高帝庙消失于何时，史籍没有明确记载。乾隆《高邮州志·古迹》载：“汉高帝庙，在沛城村……今久废，基址尚存，约八尺有余。”乾隆志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，也就是说，约250年前，汉高帝庙虽已久废，但“基址尚存”，且“约八尺有余”的数字还比较具体直观。至民国，遗址亦不存。《三续高邮州志·祠祀志》提出了另一种可能：“寿佛寺，在塔尔集。……查前志沛城村有汉高帝庙、汉更始皇帝庙，皆久废。塔儿集地望适合，则偶像当系二庙旧像，然不能确定为谁矣。”但口气十分含糊，参考价值不大。

至于沛城村汉高帝庙消失的原因，主要是汉元帝后，朝廷废止了官祀高庙制度；再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，就是高帝庙处于高邮湖区，屡有大水过境，消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。虽然如此，沛城村汉高帝庙仍然在史籍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。刘邦的身份是大汉开国皇帝，无论是遵朝廷谕旨所立郡国高庙，还是为纪念沛公曾经此地而建的纪念场所，都必然地带有大汉帝王身份的烙印。湖西地区有神居山、悟空寺、汉广陵王墓，以及相公坟、沛城孙氏等历史遗迹，再有汉高帝庙加持，必然会给高邮湖西增添一份历史文化的厚重，其影响和意义不可小视。

古庄董潭

□ 张存玉

我的老家在高邮临泽的千年古庄董潭。这片水乡热土，枕着万顷芦苇、绕着九曲清流，藏着我一生最温润、最鲜活的人间烟火。岁岁年年，时光流转，他乡的风景换了又换，可梦里的董潭，永远是那幅水绕村落、绿树掩映、芦摇鹭鸣、市井温热的模样，鲜活如初，从未褪色。

董潭最动人的底色，是那一望无垠的万亩芦苇荡。春来芦苇抽芽，嫩青的芦尖刺破粼粼碧水，满目清新；夏至芦叶婆娑，层层叠叠的绿浪绵延天际，清风过处，沙沙声响不绝于耳，像是大地轻柔的絮语；秋深芦花飞雪，漫天白絮随风漫舞，薄雾笼罩芦荡，朦胧悠远，意境万千；冬日芦秆凝霜，静默伫立在水畔，守着一方水乡的清寂安然。

芦荡之下，是丰饶富庶的水乡肌理。清清浅浅的水泊里，鱼虾、菱藕、河蚌、螺蛳生生不息，四季皆有馈赠。清晨薄雾未散，便有乡人摇着小木船入荡捕捞，竹篙一点，船桨轻划，划破荡滩晨影。一网下去，活蹦乱跳的白条、鲫鱼、小龙虾跃出水面，这是水乡独有的鲜活与富足。

有活水芦荡，便有成群的飞鸟在此栖停盘旋。清晨天光微亮，鹭鸟、水雀便伴着晨雾起飞，掠过芦梢、轻点水面，追逐游鱼；日暮斜阳西垂，归鸟成群落回芦荡深处，叽叽喳喳的鸣叫声，揉碎了水乡的静谧。朝有飞鸟逐水，晚有归禽栖芦，让这片古荡从未有过半分寂寥。

依水而居，是董潭人亘古不变的生活常态。旧时村里家家户户坐落有序，清一色的土坯茅草屋，是古村最鲜明的印记。黄泥夯筑的墙体敦实厚重，历经风雨冲刷，沉淀着岁月斑驳的纹路；整齐铺就的茅草屋顶，遮风挡雨，冬暖夏凉，藏着最朴素的安居岁月。

整个千年古村，被一条弯弯曲曲的大河温柔环抱，造就了董潭得天独厚的水乡格局。河水常年清澈流淌，绕着村落蜿蜒回转。村里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拱桥横跨河面，青石斑驳，纹路沧桑，承载着数百年的人来人往、岁月更迭。桥身历经风雨洗礼，古朴雅致，立于桥上远眺，碧水、茅屋、芦荡、云天尽收眼底，妥妥一幅天然的水乡古画。

连通村落与外界的，还有四座古朴的木板桥。每座桥梁由实木拼接搭建而成，踏实稳固，是旧时乡人出行劳作、互通往来的必经之路。日日年年，风吹日晒，步履踩踏，木板变得光滑温润，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古村的烟火与岁月。四座木桥连着田野阡陌、连着四方乡邻、连着世间烟火，默默守护着古村的晨昏日常。

贯穿村庄南北的夹沟河，是董潭的命脉，也是古村最热闹的所在。河水潺潺向南流淌，贯通内外水系，滋养着全村生灵。河旁一座高耸的瞭望塔凌空矗立，是董潭最醒目的地标建筑，守望整片村落与万亩芦荡，阅尽古村千年变迁。

旧时的夹沟河，水运繁华，烟火鼎盛。河面之上，南来北往的商船络绎不绝。商船载着南北货物，顺着水路过境、停靠、交易，让僻静的水乡古村，成了远近闻名的水上商贸集市。河道两岸顺势铺开一排排摊位，本地乡民售卖自产的鱼虾菱藕、杂粮蔬果、手工物件，外地客商带来南北百货、新奇吃食、日用杂物。舟楫咿呀、人声鼎沸，十里烟火蒸腾，热闹非凡，尽显水乡市井的鲜活繁盛。

古村之外，是一望无边的良田沃野，田间静静伫立的老式农具，是农耕岁月最忠实的见证。木质风车高高挺立，结构精巧，稳稳扎根田头；脚踏水车依河而建，连接水土，便民灌溉。每逢农忙时节，乡人踏动水车，流水汩汩涌向田间，滋养禾苗、润泽良田；风车昼夜伫立，随风而动，脱粒扬谷、助力农事。它们伴着四季农时，守护着庄稼生长，也定格了最质朴的农耕乡风。

时光更迭，岁月变迁，古村的风貌也悄然改变。如今村里纵横交错的老街小巷，早已不复往日模样。曾经遍布街巷、养家糊口的篾匠、木匠、瓦匠、铁匠等一众手工匠人，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传统手工技艺慢慢沉寂，那些叮叮当当的劳作声响，终究成了一代人的怀旧记忆。

岁月悠悠，最让我念念不忘的，是村里那几家老牌烧饼店。从小到大，这几家烧饼店都是我的心头惦念，是刻在味蕾里的乡愁。嘴馋的时候，便去买一块刚出炉的黄烧饼。滚烫的烧饼外皮金黄酥脆，内里松软香甜，麦香混着炭火的焦香，一口下去，朴实的美味，足以慰藉所有寻常日子的平淡与琐碎。这块朴素的黄烧饼，承载着我的童年欢喜，藏着独属于董潭的烟火滋味，多年过去，依旧是无可替代的故乡味道。

悠悠千年董潭，漫漫故土情深。这片芦荡环抱、流水滋养的千年古村，有芦荡鹭鸣的诗意风光，有小桥流水的古朴韵味，有农耕烟火的质朴温情，更有市井繁盛的人间暖意。明代诗人黄琼在《采莲歌》里这样描写我的老家董潭：“苍烟漠漠董家潭，绿树阴阴白水湾。十里锦香看不断，西风明月棹歌还。”

令人欣慰的是，如今的董潭村，继2022年10月入选“中国第六批传统古村落”名录后，2024年8月又入选“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”。

千年古庄——董潭，永远是我心底最温柔、最难忘的故土……